


CHANGGE DE NIANLING

唱歌的年龄

周伟励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唱歌的年龄

周伟励◎著

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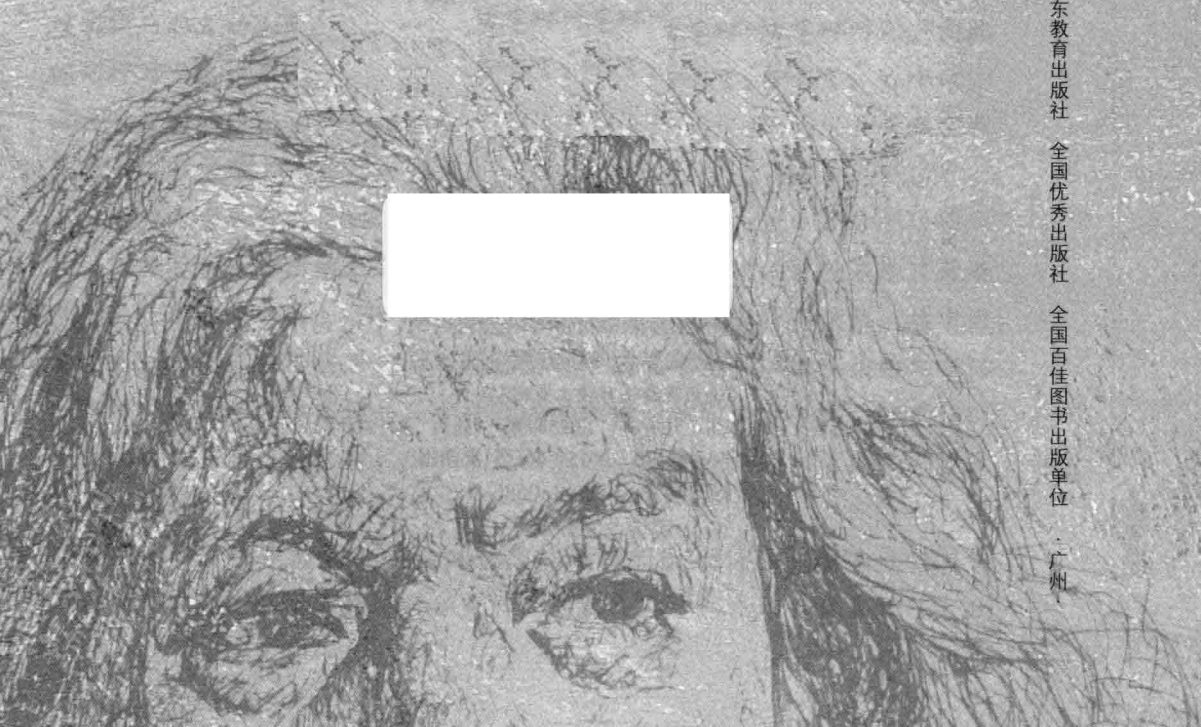
南方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唱歌的年龄 / 周伟励著. —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548-0686-9

I. ①唱…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5330号

责任编辑: 唐妮妮

责任技编: 黄 康

装帧设计: 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7.25印张 1插页 345 000字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686-9

定价: 3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我写散文

——代序

断断续续写散文已经三十多年了。

其间当然也写过别的东西，如诗歌、小说、论文，还编写过字典词典，标点整理过古籍，但是，投入最大、写得最多的，还是散文。

我写散文，大抵是因为散文创作不需要太强的虚构能力。其实我最想写的是小说，但小说创作对虚构故事情节的能力要求很高，而这偏偏是我的弱项。我的强项是修辞，遣词造句，推敲斟酌文字，爱在语言张力的拓展上下功夫，而这或是散文与诗歌作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我写散文，还因为散文创作不需要占用大块完整的时间。对于一个以编辑为职业的人来说，业余写作，只能利用茶余饭后的零碎时间，因此你只好写些自由散漫、“随心所欲”的文字（散文，或诗歌），写小说，需要长时间经营与构思，并不适合于职业编辑，因此，编辑中多有散文家或诗人，而少见小说家。

我喜欢那种有文采的文字。喜欢读，也喜欢写。

少年时读朱自清的散文、郑振铎的散文，就很喜欢，曾将朱的《荷塘月色》、郑的《海燕》一类的美文抄下来，反复阅读欣赏。稍长，读中国文学史，尤爱郑振铎所著，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极唯美的文字描述文学现象、评价作家作品，那种散文甚或诗一般的语言令我十分着迷。因为太爱那些漂亮的文字，但书又是借来的，无奈，只好用老办法，把最精华的部分用笔记本抄下来。

郑氏此著对我影响甚大。我早年所写的文字，有不少是既与学问沾点边，又尽力追求散文的文辞华美的“非驴非马”的东西。这类文字又分

两种：一种是写的时候就按“散文”来写，如这次收入本书的《我从南方来》、《哲学的贫困》、《音乐的贫困》、《反思与悖论》等等，这种文章，我自己将其定义为学术性散文；一种是探讨了有关学问的学术文章，即所谓的论文，如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李清照在婉约派中的地位》，还有研究道家思想的《道的魅力》（此文也收入了本书），等等，我也有意识地用散文的笔调和华美的文字来写，把它写成散文化的论文。这样的写作模式，如果要追根溯源，都能追寻到我年轻时曾经很喜欢的那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总的说来，我大多是用散文的笔法、心态来写文章，不管什么题材、什么专业领域，提起笔就想往散文的方向靠，恨不得把文章写成散文或散文化的“模样”，才算写好了。记得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曾经这样评价过我的写作：用散文笔法写学术文章，又在散文随笔的创作中融入较多的学术文化因素，这种力图打通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领域的努力，有可能闯出一番天地。老师的这一番评价，令我大受鼓舞，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了选择写学术散文作为自己创作方向的决心。

我写散文，当然也写过那种“传统”的以记录个人经历或社会生活为内容的记叙性文体。受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度时兴的“虚构散文”理论的影响，我那时及此后创作的一批散文虽然也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或主人公，但文章中有不少细节其实是虚构的。也就是说，“我”叙述的个人生活或亲友事迹，有可能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也就是“不真实”，但这却是我刻意为之，觉得这些虚构的细节，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

散文界和理论界对散文“真实和虚构”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我是赞同散文可以虚构的，并且在创作中也努力践行之。之所以赞同“虚构散文”，是觉得虚构乃文学的本质，即便是十分讲究“真实”的记叙性散文，也不能完全摒弃虚构。因为记叙散文创作最大的“瓶颈”在于题材的开拓，而按传统的写法，个人的经验总是有限的，写来写去，就那么点生活，就那么点经历，很容易就“江郎才尽”，如果善用虚构，则可以突破个人经验的束缚，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题材。

就我自己的创作实践而言，感觉已经不是可不可以虚构的问题，而是虚构能力有无或强弱的问题了。我写散文，常常苦于找不到题材，或是有了题材，却写不出能令自己满意的好作品，这就是虚构能力不足所导致

的创作力“缺失症”了。这样的“病症”，不少散文作家甚至名家都曾“患”过，由此可见，虚构能力其实也是散文创作的重要前提。

文化散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横空出世，给当时陷于低潮或尴尬的散文创作打开了一扇大门。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初读余秋雨《文化苦旅》时的感受：

一，原来散文是可以这样写的；

二，这样的散文我也能写。

余氏往往以浩大的篇幅谈历史事件、文化现象，行文则喜用大段的议论，乍一看并不像散文，也不像报告文学，但其善归纳与概括，能透过事件或现象的表面采掘出较深层的理性的东西来；描写与抒情虽然不多，却颇能出彩，能收画龙点睛之效，这种篇幅浩大、议论滔滔、理性机智而又富于文采的散文，的确令人耳目一新。而说“我也能写”，是因为这种融进历史文化的大散文，与我的学养、性情和兴趣相吻合，也与我此前一直追求的“力图打通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畛域”的写作路子暗合。

我豁然开朗。多年来纠结的一些问题，如题材的缺失、虚构能力的不足，等等，看来都不成问题了。因为，历史文化的领域无限宽广，三千弱水，只取一瓢，这一瓢也够喝一辈子了。

我终于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了。我的散文，必定与我的情趣胸襟有关。

二〇〇六年，我在大象出版社出版了《从菩萨蛮到沁园春——公元十世纪前后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此书从词牌的角度切入，用散文笔法抒写晚唐五代至北宋文人的风流岁月，每一个词牌，就是一篇散文。

二〇一二年，我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岭南词典——搜藏岭南的柔软记忆》，此书借用词典的形式，以散文手法绘写岭南风物，或状物，或写事，或记风物节令，或摹人情世态，每一个“词条”，也是一篇散文。

个人的偏好与时代风尚终于合二而一。

我写散文，写了几十年，也摸索了几十年，现在已是收割的季节。

我站在山坡上，看远方高天湛蓝、白云舒卷，白云下面，一马平川。



目录

- 南方的宿命 >>>1
我从南方来 >>>13
 家住南方 >>>16
 母亲的灯 >>>33
 亡兄 >>>39
 严父 >>>44
 来祖 >>>49
摇到外婆桥 >>>55
唱歌的年龄 >>>60
想飞的年龄 >>>64
爱情的年龄 >>>68
明月的记忆 >>>72
 江湖岁月 >>>82
 北山故事 >>>87
 冰泉豆浆 >>>94
 远山 >>>99
我的一九七八 >>>104
 读书记 >>>113
 八月桂花香 >>>123
 逆反 >>>128
如歌的行板 >>>130
——音乐随想录

电台纪事 >>>145

——我的编辑记忆之一

那些在河堤路十四号的日子 >>>152

——我的编辑记忆之二

城市的书香 >>>162

——我的编辑记忆之三

走过夏季 >>>170

——我的编辑记忆之四

江南意象 >>>180

香港地一瞥 >>>182

东瀛走马 >>>189

雪泥鸿爪欧罗巴 >>>198

非洲的声音 >>>210

过埃及记 >>>226

道的魅力 >>>234

哲学的贫困 >>>246

音乐的贫困 >>>251

反思与悖论 >>>254

千古独步的诗 >>>260

我们为什么读大学 >>>264

跋语>>>267

南方的宿命

南方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从历史上看，南方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

自秦始皇一统六合以来，吾国已经历过数以十计的朝代更替，但大多数朝代都选择了北方城市作为其政治中心——首都，可以说，在中华民国之前，除了明初的三十几年，南方基本上没有充当全国性统治中心的机会。在中国的几大古都中，像南京、杭州这样的南方城市，大多数时候只是充任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的都城，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脑海不时闪过南朝、南唐、南宋、陈后主、李后主、宋帝昺等悲情符号。

广州是更南的城市，她在近代以前似乎还未曾有过在政治上出头露脸的机会，南越、南汉是更偏远的地方政权，赵佗、刘龔辈在知名度上也远远不能与陈后主、李后主等相比。自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揭竿，广东开始出现风靡全国的人物，从此以后竟一发不可收拾，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广东人物一时引领风骚，蔚为大观，一部近代史，差不多都是广东人在唱主角，于是，广东也就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然而南方注定不能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尽管历史已走进了近代，也依然如此。地处边远的广东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号称“六朝古都”的南京，也难逃“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命运，蒋介石政权在此也仅仅维持了二十来年光景，便仓皇辞庙，败退海上。

南京是一座悲情城市。相传秦始皇南巡至龙藏浦，发现有王气，于是凿方山，断长垄为渎入于江，以泄王气。此渎即为秦淮河。“秦淮”者，秦人“坏”金陵之王气也。因此，金陵虽有虎踞龙蟠的地形之胜，但其作为帝王都的“王气”也真是不算强盛。所谓“六朝古都”的“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其实都是偏安一隅的政权，而且国祚大

多不长久，最短命的齐朝竟然只得二十来年的寿命！

这难道是南方的宿命！

南方在政治上不得志，只好在经济上下功夫。

早期中国社会的经济重心，一定是跟政治重心高度重合的。那些马上得天下的统治者，一定会把他的国都定在一个最富庶的地方。秦汉两朝的开国者都把都城定在渭河平原，在当时以及往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渭河平原当然是中国最富足的所在。秦汉时的渭河平原森林密布，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与今日的植被稀少干旱缺水可谓天壤之别。自秦汉至唐的一千年间，尽管经历了无数的战乱和灾害，渭河平原仍顽强地保持着她的丰饶与富庶。这也就是中国这几个最强盛的王朝都将国都定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然而，长期的掠夺性开发和无数战乱兵燹（尤以汉末—三国、晋末—南北朝、唐末—五代等乱世为最）的摧残，终于使得以渭河平原和中原一带为代表的北方的地力和人力严重衰退，于是，此后的王朝建立者开始把眼光转向南方。

南方被大规模开发应该还是比较晚的事。北方历来多战乱，而南方则相对较平静，我们常常说“逐鹿中原”，却很少有说“逐鹿江南”什么的。在北方如火如荼的战争中，南方静悄悄地在搞“建设”，随着大量北方移民的不断南下，南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如果我们把江南当作南方的代表或中心的话，那么江南的富庶正是中原朝廷持续南迁和北方移民不断南下开发而形成新的政治与经济中心的结果。

江南的繁盛应该是跟历史上的汉末与晋末之乱密不可分，从三国东吴直至南朝的不断经营使金陵成为“六朝金粉地”；而西蜀、福建、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发展也与唐末之乱脱不了关系。五代时，北方政权走马灯似的变换，五个朝代的轮替只不过才用了五十余年的光景，国祚长者十余年，短者仅四年；而南方各国一般都有三几十年的寿命，国祚长者如吴越竟享国七十二年，因此，五代十国时期总的形势是：北方动荡，南方相对平静。相对平静的环境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我们从后蜀广政三年（940）赵崇祚编的《花间集》中可以读出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绮丽与奢靡，而这种绮丽与奢靡当然只有富裕安逸的生活才能派生出来，由此可

见西蜀已经成为当时的经济与文化中心。

但是，从五代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赵宋没有选择江南或西蜀作为其都城的所在，河北汉子赵匡胤看中的是汴梁——战国魏都故地，五代梁、晋、汉、周之都城。汴梁坐落在黄河下游的黄淮平原上，相对于地处渭河平原的长安，汴梁当然也属于南方，它的富庶有留存至今的北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证。前些时候有外国学者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题目好像叫《从纽约到开封》），称这座古都为一千年前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历史上第一个将一个大一统国家的首都设在严格意义上的南方城市的统治者。朱元璋定都南京，当然与他是南方人大有关系，但此时的江南，经过一千多年的开发经营，也早已具备了成为一国首都的各种条件，朱元璋在定都之际，一定反复考虑了这些因素。可惜的是，朱元璋死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了政权，遂将都城迁往北京。于是，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第一次机会就这样被“腰斩”了，“金陵王气”再一次受到沉重打击。此后，北京便成为最耀眼的城市明星，成为绵延六百年一直至今的中国政治中心（这当中仅有二十二年为蒋介石政权都南京）。

南方不受政治家的青睐。南方与政治似乎有些隔膜。

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是广东，广东是真正的南方。

当气宇轩昂的木棉树脱尽一身绿叶，血色的花朵傲立枝头；当绵软的风拂面而过，湿漉漉的空气仿佛可以拧出水珠；当璀璨的夜市把喧嚣散入寻常巷陌，不眠的欢乐在五光十色下流淌；当缀满露珠的鲜花遍布街市，绿色的潮水漫过冬日的轻寒；当行色匆匆的人流在眼前掠过，时间与效率被看得和生命同等贵重……肖风知道，这一定就是南方！这一定就是广东！

肖风是在一个春日的早晨触摸到广东的脉动的。

那时肖风在故乡省城的一家出版社任职，正在活动调广州工作。那一天，他拿着一封介绍信，走进一家大型国企总经理的办公室。经过一阵简短的问答，不到十分钟，总经理便按下了桌上的通话键：

“李部长，请你到我办公室来。”

旋即，一位靓丽的白领走进肖风的视野。

“李燕，这位是肖生。你马上开一个商调函，给他带走。”

李燕转身出门。不到十分钟，便将商调函送到肖风手上。

从进门到出门，前后也就二十分钟，肖风便拿到了调往广州的“通行证”。

肖风顿时生出了做梦的感觉。这就是广东的效率！这就是广东的速度！天哪！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用经“班子”研究研究，没有挑剔猜疑的盘问，也没有琐屑烦人的手续。独断专行，一言九鼎，一锤定音，这就是真正的企业家啊！这二十分钟的经历印证了他从艺术作品中得到的企业家的铁腕形象。肖风人还没到广东，就完全被广东人和广东的效率速度震住了。转眼间到广州已经十四年了，肖风对广东的看法自然是一言难尽，但在他心底里始终保持着一份对广东的敬佩，他知道，那一定是当年的那一次“遭遇”落下的“后遗症”。

广东远离中原，远离北方，也就是远离北方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这种远离造成广东很大的尴尬，因为中华主流文化基本上是从这一套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生发出来的。广东方言（这里是指广州话）可以说是一种世俗性和市井味很浓的语言，这种语言难以进行比较高级的思维活动，广东话不能直接转换成书面语，广东人写文章必须使用北方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才能将所思所想形诸文字，因此广东人往往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勤于动而拙于思。所谓“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看到黄灯赶快走，看到红灯绕道走”的种种说法，正体现了广东人的这种特点。

然而，事物的利弊往往是可以转化的，这种带有明显缺憾的特点有可能是帮助广东成就了三十多年经济辉煌的因素之一。相信邓小平在选择广东做改革开放特区时一定进行过深入的周全的思考，广东人“敏行讷言”、“不争论”、“做了再说”的实干精神，在本质上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哲学思维是一致的。

广东这类“多做少说”或者“光做不说”的人很多很多。刚到广州时，肖风参加了一个颇为豪华的酒会，与会者多为媒体记者和文化人，主人是一个据说有过亿身家的企业家。这位亿万富翁其貌不扬，操一口粤味普通话，一副刚刚洗脚上田的模样。虽说是大富豪，又是主人，但此人极其低调，在座中几乎不说话，只是微笑地看着周边的文人高谈阔论。肖风

正好坐在他旁边，便和他聊了几句：

“你下海几年了？”

“不长，也就十来年。”

“才十来年就挣回那么大的身家，太厉害了。”

“没什么，我们没文化，看不懂那么多红头文件，跟着感觉做就行了。”

他的话使在座的许多文人惊讶不已、感慨万千。肖风一点也不惊讶，其实，他的话说出了广东不少企业家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他们不会在一些概念或话语上作过多的纠缠，只凭生意人的本能和感觉来做事，而这种本能或感觉往往最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最能把握改革开放的本质。

广东远离中原，远离北方，也就是远离权力中心，远离战乱。于是，广东人一心一意地过着世俗气息颇浓的宁静生活，形成一种追求物质享受讲究生活质量的生存模式。无论是“叹世界（享受生活）”抑或是“讲饮讲食”，都十分鲜明地显示出广东人对世俗生活的欣赏态度。这种“讲饮讲食”的生活习俗当然要以一定经济基础与物质生产为前提。

广东地处岭南，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为一年三熟，珠江三角洲一带更是水网密布、河汉纵横，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广东人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丰富的物产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生活原料，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又使得他们比北方人要消耗更多的体能，于是，“老广”们便一个个都成了“老饕”，“吃”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广东人的能吃与会吃是举世闻名的。不说那花样繁多、争奇斗巧、精美异常的菜肴与茶点，也不说那人声鼎沸、灯火通明、二十四小时川流不息的酒楼与食肆，光说广东人对“吃”所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热情与不屈不挠的干劲，就足以证明“食在广州”真真正正是实至名归、不可撼动的。

又要说到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了。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六时刚过，在广州长大的堂姐与姐夫就带着我急匆匆地往茶楼赶，边走边说“迟了、迟了”。我还没睡醒呢，脑袋糊里糊涂的，心里直纳闷：一大清早的，迟什么迟？赶到附近的茶楼，刚一进门，一眼望去，只见烟雾缭绕的灯光下黑

压压的一片人影，沸腾的人声和着烟味酒味点心味肉菜味扑面而来。我睡意顿消，望着眼前“乌烟瘴气”的场面，心里直打退堂鼓。进了大厅，一位漂亮的服务员小姐拦住堂姐：

“有位了没有？”

“没有。”

“那请到外面排队等候。”

什么？还要排队等？我转头一看，是的，大厅外面站着一大群人，进来的时候没留意，原来他们都是等位子的。我生性不喜应酬与烦琐，这里空气这么差，环境如此嘈杂喧闹，本来就令我不快，现在居然还要排队，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气不打一处来：

“吃个早餐何必这么麻烦，姐，我们不等了，走吧！”

“哎呀，这哪是吃早餐那么简单，这叫饮茶，是广州的一种文化，我特地带你来见识见识……”

堂姐摆出一副都市人见惯大世面的样子，教训她这位“乡巴佬”弟弟。姐夫怕我不高兴，连忙在一旁说好话：

“等一等吧，很快就到了。今早起床晚了一点，星期天饮早茶的人比较多。”

结果，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饮上早茶。看着堂姐和姐夫很享受很惬意地“叹”“一盅两件”的样子，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们都是打工一族，平时忙忙碌碌，惜时如金，最不耐排队等人什么的，但对上茶楼排队饮茶吃饭却有着非凡的耐性。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地道的广州人差不多都这样，在吃方面很舍得耗时间，吃饭饮茶排半天队等位是常见现象。

我一个同学的表哥住西关，他靠父母留下的房产出租度日，过了半辈子舒服日子。他不上班，也不干什么事，成天就泡在茶楼里，早茶，午饭，下午茶，晚饭，夜茶，一天五吃，他起码占了四。按说像他这样吃法早就吃成个大胖子，可他不，精瘦精瘦的，活像个“粉友”（吸毒者）。我在同学的引领下到惠如楼（那时还没拆）见识过他的“吃功”，早茶与午饭直落两餐，就把我吃得“趴”了下来，下面的茶、饭便不敢“恋战”了，可他就像没事人一样，连声招呼我下午再来吃。

这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大多数广州人都不会像这位仁兄这样子

吃，但广州经常光顾茶楼食肆吃饭的人还是太多太多，广州的饮食业如此火爆，与这些人的“贡献”分不开。广州的饮食还有一个特点，即来吃的人大多是私人消费。老头老太太早上饮茶就不用说了，年轻人要享受生活，懒得煮饭，得，上茶楼；中年人事业要紧，不想煮饭，得，上茶楼；节庆相聚，亲朋来访，生意倾谈……连想都不用想，得，上茶楼！

广州人的“讲饮讲食”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嗜好，即便是在四十多年前的那一段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广州人对吃的热情也没有稍减，饮茶这种近乎“奢侈”的消费也仍在继续，连“文革”那样一场声势浩大横扫一切的风暴，也没能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真的是令人不可思议。

广东文化的这种浓厚的世俗气息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其文化的发展路向。广东文化尤其是广府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市民文化，因此，适应市民阶层娱乐与休闲需要的文化品类在广东特别发达，从而呈现出其文化品质上的快餐性与商业性特色。广东是经济强省，但在文化上却不敢称“强”称“大”，因而才有“建设文化大省”的呼唤与呐喊。其实这可能只是一个文化观念上的问题。广东是企业家、金融家的乐土，而并非传统的文化人叱咤风云纵横驰骋的地方。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把那些“快餐”类的文化产业也看作是文化的话，那么广东理所当然地要在“文化大省”的序列上占有一席之地。广东的娱乐文化业、传媒业、会展业、广告业、饮食业、酒店业、旅游业等等都很发达，我们能够说这些东西不是文化吗？我们不要一提“快餐”就摇头。美国文化不也是“快餐”文化吗，可人家的文化辐射力是最强的，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同在新闻出版的招牌下，广东是传媒业发达而出版业却不怎么样。这大概是因为前者属于轻便快捷的“快餐”，与广东文化的市民性特点相契合，而后者则是有点“古板”和“传统”的“正餐”，需要较多的时间来经营，更需要较为深厚的文化积淀作支撑。同是“文化人”，在广东，传媒业者一般都显得春风得意、神采飞扬，而与“出版”打交道的，包括作家、学者、编辑等，就要相对寂寞些。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多年前我在一家出版单位供职时曾经参与组织了一套大型图书《中国大通史》，这是一套摒弃传统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写

法，把历史还原为人与自然、社会、经济等的关系史的新型通史著作，应该说极具学术性与开拓性。但这套巨型史著的出版最终还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夭折了。按理说，在广州要找三两百万出这类书当不是难事，关键还是文化认同问题。我们的领导者往往比较熟悉“快餐”的操作，而对出版这类长线的活计就相对陌生。他们会为一个万人歌咏的电视节目不惜一掷上千万，但却不能拿出区区两三百万元来出这些书。他们或许认为电视受众广、影响大，能产生大的轰动效应，而图书能有几个人看？而在搞出版的看来，电视节目虽能轰动一时，但毕竟转瞬即逝；而书的影响力则有可能会长达数十年。

这或许就是文化观念的冲突了。从广东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广东人喜欢“快餐”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广州虽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但广州从来就不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都市，而只是一处历史悠久的商埠。商业城市造就了市民浓厚的商品意识，也必然造就一种浓厚的商业性文化品格，因此，广东人喜欢“快餐”，其实真有点“与生俱来”的意味。

肖风从内地来广州已有十多年，一直都保持着看中央电视台的习惯。肖风并不认为中央台的节目有多好，可能只是出于文化的认同和职业的需要——他常看的是它的新闻节目。但肖风在广州的所有亲戚，几乎没有哪一家是习惯或喜欢收看这个全中国最大也是最权威的电视台的。肖风的亲戚收看的都是粤语台，从香港的“翡翠”、“本港”到广东的“珠江”、广州的城市频道等等，看的节目也几乎都是剧集。像《外来媳妇本地郎》这样的电视剧，肖风是一点儿也看不进去，他们却看得津津有味。后来他终于发现，广州的市民阶层，差不多都是这样。他们喜欢看那些通俗的、市井味浓的、夸张搞笑的剧目，而对那些严肃的、深沉的、庄重的、宏大的东西不感兴趣。这便是长期的商业性文化品格培养出来的文化趣味，不能说这样的文化趣味就不好，但它追求的必然是轻松的、明快的、新奇的刺激，与深刻、崇高、痛苦、思辨等无缘，这大概也是“快餐”所要达到的效果吧。

广州市民尤其是中老年男性市民几乎都有读报的习惯——早上看日报，下午看晚报。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快餐”文化现象。很多市民可以不看书，可报纸却是每天必读。这或许就是广东传媒业发达而出版业不行的

原因所在了。肖风的一位亲戚是个退休工人，他每天的阅读生活很有规律：清早上茶楼饮茶，顺便就买一份《广州日报》，边饮茶边看报，饮完早茶，报纸也就看完了；午睡起来，上街买一份《羊城晚报》，然后就很随意很闲适地翻阅着，用这份报纸打发直到晚饭前的那一段时光。为适应这种需要，广州的报纸对社会新闻都极为重视，十分舍得给版面。《羊城晚报》就曾为一个产妇在救护车上生下女孩但却怀疑医生换错的事件连续报道了十几天，这组报道给肖风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许多年后他仍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不少细节。前些年发生的打工青年郭云将三岁女孩任湘扔下天桥至死而后跳桥自杀的事件，广州各家报纸都给予了持续不断的大篇幅的报道。这些报道说不上深刻，甚至说不上生动、精彩，但它贴近市民的生活，甚或就来自市民身边，因而能够牵动市民的神经，满足市民对现实的关切和知情欲望，因而也就满足了“快餐”文化的诸种要素。

商业城市的文化特点就是“快餐”，它的文化优势也是“快餐”。在这一点上，广州与香港极为相似。我不认同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当然也不认同广州或广东没有文化的说法。我反而觉得，香港文化是中国文化一种新的质，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而与香港文化相似的广东文化，当然也是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不大相同的新的文化因子。中国不缺传统文化深厚的城市，缺的是香港、广州那样的喜欢“快餐”的现代城市。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是香港回归前的最后一个平安夜，那一晚，我是在香港度过的。当时我正在香港圣约翰大教堂观看弥撒典礼。朋友告诉我，港督彭定康将会出席此次弥撒，话音刚落，就看见这位末代港督向我站的地方（教堂门口）走来。我故意不闪避，气宇轩昂地站在路的中央，我要看看他的扈从会不会将我驱赶。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彭定康快步走过我身边，也许看了我一眼，也许没有看，便径直往教堂里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走去。

我对彭定康爵士没有好感：因为他在香港回归前的种种表现。之所以要在此说这件事，只是想说明，在香港，即便是像彭定康那样的高官，对待一般市民，也会把姿态放得很低，以显示其“亲民”形象的。[在差不多十年以后，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了杨澜专访彭定康的文章，里面提